

编者按:这是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各部各期学员对在校时期学习与生活的回忆,他们深情的回忆把我们带回那个艰苦而火热的年代。

追忆艰苦而火热的年代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生活回忆

(民大一部学员 赵仰仑)

我们学习在民大

(民大一部民族班学员 吉庆 燕初彦)

1951年夏天,原计划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我们,因中央民族学院的房子没有盖好,组织安排我们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我们被编为四部民族班,后转为一部民族班。我们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集体宿舍,睡通铺木床,冬天木炭火盆取暖,一人发一个学习板、小木凳子。小教室里有桌子板凳,听大课到大席棚里,席棚既是大礼堂,又是大餐厅,没有任何桌椅板凳,听报告自带小凳子和学习板。教师、学生都在地上吃饭。生活很简朴,但很有味道。

我们的班主任是赵光勇老师,进行一个月的汉语速成学习后,我们很快就听懂了汉语讲课,也看懂了报纸,也能简单地记日记、写学习心得,

这对我们来讲是巨大的进步。

初步过了文化关,就转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学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纲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即“人民民主专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主要方针政策”等。

在学习期间,我们听过校长刘瑞霖的报告,教育长高云屏、四部主任刘若曾、一部主任杨典和康主任等前辈的讲课。我们年轻人跟着延安大学的老前辈,学习了革命理论,懂得了革命道理,在民大这个革命的熔炉里受到教育和锻炼,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

值得一提的是,燕初彦和我于1953年3月在民大一部结婚,我们的班主任赵光勇同志为我俩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证书

操办婚事,一部康主任为我俩主持婚礼,父母般的亲切关怀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怀念。

(来源:《情系锡伯》,吉庆著辽宁出版社,2014年)



西北民大教学计划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我是1950年2月到西北民大一部报到的。

民大一部主任马晓云,组教科科长杨典,讲课教师陈典外,还有张宜等。一部学员多数是教育工作者,所以被称为教育研究班。



三部同学参加集会活动

回忆我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过

(民大一部学员 李有禄)

一部有好几个班,上课时各班学员在一起听讲,采用上大课形式。一般是上午听讲,下午讨论。学习内容很丰富,思想性很强。我到民大学习只有半年时间,却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西北民大是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成立的。学员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存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思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西北民大非常重视劳动教育。民大一部、三部的办公室、宿舍、教室,都是上一期学员动手修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这是我在民大时第一次听到的。

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学员们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交

代了个人的历史。学员到校时,都填了简历表、自传。学习将结束时,学校忽然将这些材料当众焚烧,让学员重新填写。后来才知道,初入校时,学员思想有顾虑,填写历史材料难免有不真实之处,学校这样做,也是对党对人民的负责。

由于学校初建,设备简陋,没有饭厅,就择地而坐,露天而食,宿舍打通铺,一个宿舍住8人。学生伙食办的不错,6人一席,有荤有素。学员每人发布制服一套;朴素大方。上课前唱革命歌曲。礼拜六还看校文工室表演的节目。1950年8月,结束了紧张、活泼、愉快的学习生活。结业后回到银川,组织派我担任教育厅科员、宁夏中学教导主任等职。

(来源:《宁夏文史》第15辑,1999年)

在革命大熔炉中

(民大三部学员 张静远)

我是7月在表兄王云霞(华阴解放时的党代表)的指点下,到西安报考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前身为延安大学)。8月《群众日报》登载了录取名单,我被录取。入学报到的日期记得是8月中旬。考试报到地点都在西北大学。入学后,把我分到三部二十五班,住在西安东关一所私立中学。西安期间,9月21日在校部广场参加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显著特点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人,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哺育人,以艰苦朴素的作风熏陶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从思想感情上凝聚人。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学习过程中贯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国内外的历史实际与当前的形势、社会思想动态以及学员的思想实际,并结合参加对比忆苦等活动进行具体而生动的思想教育。通过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活动,学员们在改造思想提高认识上普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初步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增强了革命自觉性,加强了组织纪律观念,基本上具备了一个革命干部所应有的思想政治素质。“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团结互助、艰苦朴素”十六字校风,即是民大精神的写照。

学校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涇阳永乐店,始终坚持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校风。每到一地运输校具和物资,修建校园、校舍、铺道路、建操场、筑围墙等等,都是动员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自己动手搬运木料和砖瓦。刚迁到永乐店,我们三部同学就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劳动。这里的校舍是个破烂的旧仓库。满院积水,屋外长着一二尺高的杂草。面对这样的状况,三部主任刘若曾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四天建校任务三天完成”,同学们劳动热情非常高,大家一齐动手,清理积水,清除杂草,搬砖铺地、支床等,很快就完成了1000多人的住宿。开辟了三个操场。打了两口井,解决了饮水不足的问题。建校工作进行了3天,校园四周已改变了过去荒芜的面貌,呈现出一片新景象。

学校的规模比较大,设备十分简陋,开始没有教室,上大课都在露天,遇到雨天为了不耽误,同学们坐在走廊下面听课。后来修建了三个“大礼堂”,是用芦席盖成的,下雨时屋里下雨,外边下大雨,但同学们仍然坚持都在上课。上课没有课桌,每人一个小木凳,一张2尺见方的木板(叫学习板),放在膝盖上记录讲课的内容。吃饭也没有饭堂,晴天在大院子就地用餐,雨天把饭菜抬到宿舍床铺中间,吃的主要是小米饭。尽管设备这样简陋,条件这样艰苦,但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大家都是那样的认真听讲、记笔记。几百人在一起上大课,仅能听到讲课人的声音和大家记笔记的声音,那种严肃的气氛,认真学习的态度和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时至今日我还记忆犹新。

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知识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中的落后成分,发展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按照这个方针课程设置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历史唯物论——主要讲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世界,五种生产方式,国家与政治,社会思想意识等。另一门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主要讲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再是结合当前形势与任务,讲述党的路线和政策。教学方法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教学。

记得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大多是学校的领导,有李敷仁校长,刘瑞霖教育长,刘若曾部主任,王云凤副主任,张宜、王林、余念等教授。他们讲课重点突出,表达清晰,联系实际好,说服力强,深受同学们的欢迎。特别是李敷仁校长给我们讲《论人民民主专政》时,讲得非常生动,句句中肯,操着一口关东话,字正腔圆,吐字清楚,幽默动听。李校长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你们来民大学习,我表示欢迎!你们要勤奋学习,努力上进,接受教育,学习理论,改造思想,一生一世都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将革命



学员在学习讨论中

进行到底,到底就是到死。这是我对你们的厚望。”经过3个月的理论学习,我和同学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了很大的转变。

1949年12月,我申请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了1950年2月,我参加了三部党总支在学生中开展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活动,3月25日党总支正式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月末参加了党总支举行的新党员入党仪式。经过数月紧张的学习,思想认识提高了,革命知识增长了,身体强健了,入了团、入了党。

1950年3月的毕业前夕,学校发起了爱校运动,利用课余时间,除了为母校捐书外,自己动手在校内空地上修建了一个“新生园”,一进园门就看见用红砖砌的一副对联:“革命读书地,光荣幸福乐园”。园内有花草、假山、水池,还有可供休息的茅草亭,最有意义的是中间挺立着一个纪念碑,塔身的每块砖上都有同学自己亲手雕刻的姓名和题词,有的题词是:“革命熔炉”“革命大家庭”等等。塔的正面镶嵌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十个大字。

我的一生之所以能够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溯本追源,是母校延安大学的哺育。“我们是民大炼成的钢”。母校生活,念兹在兹,其情其景,总是历历在目。

(来源:《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远方出版社,2011年)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后,我随教育研究班一起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分在涇阳永乐店民大一部。

西北民大是一所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短期干部培训学校,在教学上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上大课,小组讨论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形式。

学校设有图书馆,设备虽然简陋,但里面却藏着各种书籍。既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甚至还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开放借阅,让学员自己鉴别。

民大的学习虽然很紧张,但生活却十分愉快。学校设文工室,配合每一阶段的学习为大家演出一些很有教育意义的剧目,比如《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

民大校部在通远坊,利用的是一处教堂。一部和三部都在永乐店,我们在开学时每人领了一个小板凳和一块“学习板”,上课时坐在小凳上,将木板平放在膝盖上,就算有了全套的课桌凳。上课前每人还发个钢笔尖,一包蓝颜色纸和几支黄川纸。笔杆自己磨,墨水自己泡,本子自己订。

民大的学员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伙食由学校供应,每日三餐,大多是小米稀饭加馒头,还有几个素菜。吃饭没有饭桌,八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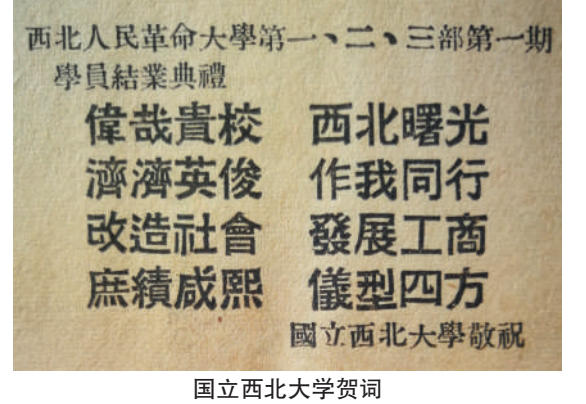
到民大后,组织上指派我担任学习组长,所以与教师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深感民大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团结的、同志式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习仲勋关心着学校的工作和学员的学习,由于西北局的工作繁忙,所以很少来校,参加过学校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李敷仁校长却经常和我们一起,他是一位平易近人,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我们是1950年8月下旬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李敷仁校长的一段讲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只要你能为人民着想,肯为别人着想,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你温暖的家园,都会有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想从别人身上捞取好处,为自己打算,即使留在自己家里,你的兄弟姐妹也会厌恶你,你也不会有什么温暖和幸福。”

这段学习生活,过去已经整整四十年,四十年前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些啥,我不一定能记得住,但是他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作风,严肃认真、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以及民主争辩、服从真理、团结紧张、民主平等的良好校风,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深感民大良好的教风和校风,有时比课堂上的教育内容更能收到教育的效果。

(来源:《西宁市城中区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10月,第1版)



国立西北大学贺词

李敷仁的传奇人生

(马琦)

李敷仁(1899—1958):陕西咸阳人。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他改革教育,刻苦工作,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表扬。1949年,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入西安,李敷仁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我们要给自己念有用的书,给家庭做要紧的事,给社会做有益的事”,这是李敷仁先生1937年为他家乡咸阳县的北杜镇中心小学所题写的“三给箴言”,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写照。

祖籍蒲城,家世悲惨,其父逃荒落籍咸阳

李敷仁(1899—1958),原名文会,字敷仁。李家祖籍蒲城县三合乡李家村,祖父李荫农为养家糊口,在渭南县教学,留祖母白氏一人在老家操持家务。光绪三年,关中闹饥荒,饿殍遍野,东府川道山坡地带时常有野狼出没,阴衣不慎被恶狼咬死。李敷仁的父亲李祖培护送荫农先生的灵柩返回蒲城,谁知一进门,才发现白氏已经饿死了。当时李祖培才十二岁,埋葬父母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延安时期李敷仁校长在窑洞前

后来,蒲城县衙开仓放赈,秀才可以领双份口粮。村里人忙来告知祖培,说:“你爷是双粮,你爷也是的,你饿不死”。祖培赶到赈济点,发现他家的粮食已经被别人冒领了。无奈,他只能一路西行,一直走到富平县城,饥饿难耐,头一沉就栽倒在北城门洞下。幸得一位拉脚能卖膏药的人看见,给喂了点馍,才渐渐缓过气来,就跟卖膏药的来到咸阳县朱家村。

天下雪,祖培从井上担水回来,看见雪已经掩埋了小路,就借了把扫帚,把井院子通往朱家村各户的路都扫开。这个不经意的善行被村中德高望重的朱三老汉瞧见。第二年秋天,朱三就托人设法将祖培介绍到北杜镇一家铺子做生意。从此,就在咸阳县北杜镇成家立业,还和朱三老汉结了一门亲戚。

得到杨虎城资助,赴日留学

李敷仁是李祖培和妻子杜氏的长子,六岁上私塾,1913年考入咸阳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投笔从戎,考入军事教育机构模范营,在骑兵科学习。1922年考入西安第三中学,接触了《新青年》《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进步书刊。由于他学习优异,交际广泛,被选为学生代表,参与陕西省学生会工作,领导学生运动。

1930年11月,杨虎城主政陕西,兴水利、办教育、资助有志青年出国深造。1931年6月,李敷仁得到杨虎城资助,赴日留学。他由上海经横滨到东京,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在高等班学习日本历史。他深知留学机会来之不易,不仅按时学完规定课程,还经常阅读白杨社、共生阁出版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利用课余时间到街市、工厂、贫民窟走访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社会问题。

李敷仁得知九一八事变爆发,立即跑到中国留日学生神田青年会,与中国留日学生商议,成立了“革命学生会”,他被选为监察委员。革命学生会的同学们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集会,要求公使“断绝国交,下旗回国”。随后,革命学生会派他负责国内西北地区宣传工作,他果断地放弃了上明治大学的计划,毅然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奋发努力,干上前去,在可能的范围内,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尽我最大限度的力量。”

做人民喉舌,创办《老百姓报》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风潮迭起。1937年11月12日,在西安师范任教的李敷仁 and 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办起了《老百姓报》,办报的100多元钱是两个新生儿满月的喜酒钱。

《老百姓报》是周报,先是八开两版,后扩为四开四版,内容有评述、社评、一周故事、名人传略、防空防毒知识、读者来函等。形式有政论、杂文和富有浓厚西北地域特色的快板、民谣、数来宝、劝善调、秦腔唱词等,大量引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方言、土语,极具通俗化、受到识字不多的底层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报》在没有代销处、发行网的情况下创刊三个月,就畅销陕西、山西、河南三省,销量达1500份。到1938年创办一周年时,就行销国内13个省,订阅户过万,而且苏、英、法、美、瑞典、匈牙利等国也有订户。

1940年4月17日,国民党当局以“登记手续不全”为由勒令《老百姓报》停刊,该报共出版113期,100多万份。

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幸免于难,奔赴延安

李敷仁的革命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极大仇恨。1946年5月1日,他在南院门省图书馆门前被特务绑架架上一辆黑色小卧车,双眼被毛巾捆扎着。车子一路向西安西北方向驶去。几个小时后,他被特务拖出汽车,左右挟持着来到咸阳塬陈老虎寨附近的一处土壕里。特务向他开了两枪,李敷仁应声倒地,特务杀人后便扬长而去。

然而,李敷仁并没有死,原来特务第一枪子弹擦脸皮打到壕壁上,又补射了第二枪,子弹从背部中央打入,穿过肺部停留在喉部动脉,失血晕死而已。随后他被一位路过的农民发现唤醒,闻讯而来的村民中有一位竟然是李敷仁的同学陈信,招呼围观群众回村取来棉、木板、被子、枕头,绑了个担架,天快黑的时候,将李敷仁护送到北杜镇家中。北杜镇的乡亲感念李敷仁曾报道咸阳县灾情,揭发县长刘法钰贪污的恩情,主动站岗放哨,掩护中共党组织将李敷仁转移到马栏解放区。

1946年7月,李敷仁奔赴延安。7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谢觉哉等千余人参加了欢迎会,听取伯平报告李敷仁脱险的详细经过。李敷仁在会上讲:“……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子弹,并没有打死我,但他

们自己等于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要炸毁他们自己!”

带领延安大学师生转战陕甘晋,保存教育火种

1946年6月,国民党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同年9月,李敷仁被任命为延安大学第四任校长。他刚一上任,就紧急召开备战动员会,号召全体同学“个个变成文武兼备的好英雄”“要学习埋地雷、抬担架、看护伤病员……要能为战争服务”。增设爆炸与救护常识课程,进行军事操练,对重要物资、图书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找安全地方掩埋。1947年3月14日撤离延安前,他召集全体师生作撤离动员讲话,他说:“我们天天喊着向人民学习,今后我们就要到人民中间去,我们的大学就叫野战大学,我们就要上新的一课了。”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转战陕、甘、宁、晋,经历了严酷的战争和生与死的考验,保存边区教育的火种,谱写了千里转战的教育史诗,创造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

执掌西北民大,勘察校址,劳动建校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延安大学南迁到西安,改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李敷仁任副校长、校长。最初西北民大借用西安西关南火巷附近的裕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东北新村的一部分房屋办学。随着一期招生工作的开展,到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时,学生已达三千名左右。原有的场地已无法满足需要,李敷仁亲自带队在西安周边勘察寻找合适的办学场所,最后选定涇阳县永乐店和高陵县通远坊两处校址。之所以选定这两处地方办学,一是由于交通相对便利,从西安到永乐店,有火车可以直达;二是场地宽阔,有一定数量的房屋,永乐店校址原为民国时期的棉花打包厂,虽然破败,但闲置有不少厂房和仓库,通远坊校址原为清康熙年间建设的天主教堂,一度成为陕西天主教中心,附设有主教府、神学院、学校等建筑。1949年10月,西北民大校部、二部迁到通远坊,一部、三部迁到永乐店。

在迁校过程中,李敷仁校长号召劳动建校,全体师生步行十里到三十里路,帮助学校装卸了六百张木板、十二个车皮的校具。永乐店的校舍,五幢库房积满了水,木材和破烂机器丢弃一地,屋外长满荒草。同学们在李校长的号召下,劳动热情很高,抬木料,搬砖铺地,很快完成了可以住一千多人的宿舍改造任务;找空地,除杂草,开辟操场;挖水井、开水池,解决生活用水;种植花草树木,建了一千多丈的土围墙,改变学校周边荒芜的面貌。据当时的《群众日报》报道,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李敷仁校长的带领下,通过劳动建校,为国家节省财富折合旧币约五亿元以上。